

减少医患冲突 需协调机制发力

近日,同仁医院一位出诊女医生徐文被她曾经的患者王宝浩持刀砍伤。9月18日,卫生部对这一暴力行为发出了强烈谴责,国内医疗界同行乃至公众对此也是义愤填膺。昨天上午,同仁医院耳鼻喉科的医务人员专门为受伤大夫举行了祈福捐款活动。

“行凶者”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。不管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有怎样的看法或质疑,都应该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,与医生或医院进行沟通,而不能突破底线,使用违法的暴力手段。暴力手段最终不仅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,还会进一步恶化医患关系。不幸事件已发生,为受伤医生祈福的同时,迫切需要深入反思的是:如何化解各种潜在的医患纠纷,医患之间如何才能达成和谐?从同仁医院公布的王宝浩的治疗经过看,患者曾于2006年、2007年先后到该院做“全麻支撑喉镜下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”和“气管切开术”。而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,2008年8月,王宝浩就将医院“推上了被告席”,认为院方有“伪造病程记录、伪造医生签名、伪造手术记录、伪造手术现场”等问题,“但至今都没宣判”。也就是说,这起医疗纠纷实际上

已经延续了四五年的时间,中间还经过司法程序,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和解,以致矛盾和仇恨越积越深,最终酿成血案。显然,现有医患纠纷协调机制并未充分发挥作用。国外应对医患纠纷比较好的经验,是设立伦理委员会。美国几乎所有的医院都设有伦理委员会,这个委员会只负责倾听医生、病人和家属的意见,并提供建议。委员会成员并非只是来自医院,而是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,医院的医生、注册护士、牧师、社区代表、社会工作者、律师等。伦理委员会成立之后,医院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。在国内,类似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已经在探索建立。卫生部从去年开始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一般设在区县,涉及司法等多个部门,由卫生部门牵头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员组成包括,离退休医学专家、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官,以及律师、公证员、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。今年5月份北京市下发《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》,由6个部门联合组建的首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。调委会将引导医患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解决纠纷,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,调委会须在3日内受理。遇到重大疑难医疗纠纷,要实行专家会诊制度,必要时还要召开听证会。调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,工作经费由财政部门安排。从成员构成到经费来源看,这有利于保证调委会的中立,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。

此次发生在前同仁医院的流血事件,以及此前不久发生在广东的病人砍死医生事件说明,当下一些地方医患对立仍然十分尖锐。期待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尽快发挥作用,减少医患冲突。 京文

如今,无论在百货商场还是网上小店,经常出现穿着似露未露的模特广告和充满诱惑力的广告词,其中一些广告图片和文字的尺度之大,让不少网友惊呼“性感营销时代来临”。上周,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,对1250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,94.8%的受访者坦言身边的“性感广告”很多,其中41.8%的人觉得“非常多”。(《中国青年报》9月20日)

“性感营销”是精神通胀的春药

在“开放”的西方国家,用“性”的手段来赢得商业利益或政治利益,亦为主流价值观所不容。但在我们这个传统和“保守”的国度,这种现象却泛滥成灾。专家认为这与“过度商业化”的趋向有关,但在笔者看来,这与精神信仰普遍性缺失的现实大环境有关——所谓“性感营销”终究是精神通胀“酝酿”的一碗春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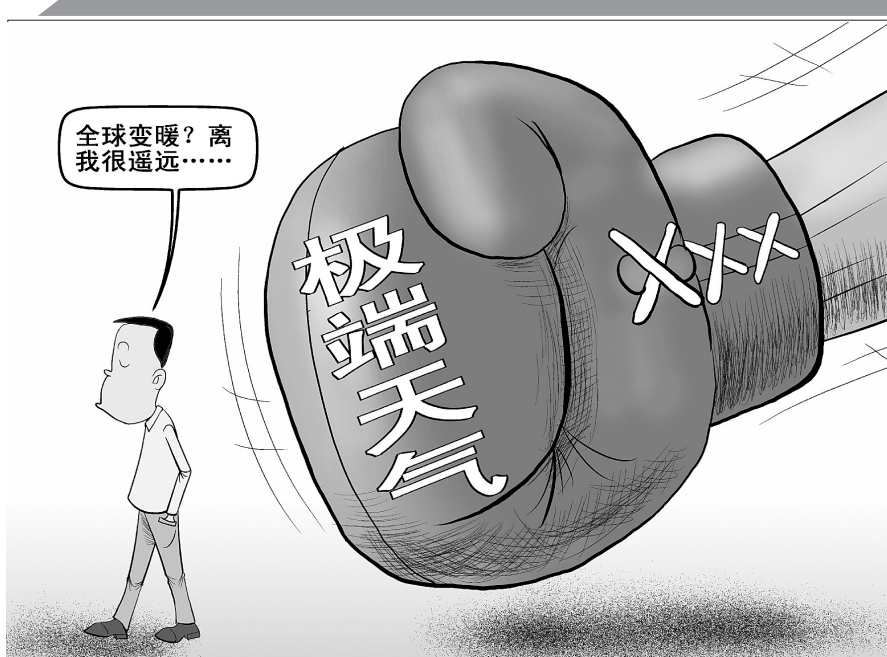
有市场才会有需求,这是一个无比直白和简单的道理。

譬如影视剧正是“性感营销”风行的主阵地。某版本《红楼梦》“性感的十二金钗”,张艺谋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的“波涛汹涌”,张纪中的“内衣秀鹿鼎记”,电视剧《秦始皇》频频出现的情爱戏镜头……性感元素横行于影视娱乐圈子,这些摆明了吸引公共眼球、具有“满足需求性”的“香艳消费”,虽引起口水诛笔伐,但却从来不乏拥趸。如是商业推波助澜下的“香艳”,如是充斥着炒作、诱惑气息的“性感营销”,如是正在颠覆传统道德审美的裸露和挑逗,既然让社会反感至斯,引来骂声一片,又何来市场呢?答案就在于此。

无须回避,为“性感营销”理单的还是大众,恐怕也包括那些在网上宣称自己性感疲劳的质疑者。未必是人格分裂,口头上的道德巨人之所以打不过欲望的矮子,根子在于“性感营销”这碗春药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缺乏抵抗力——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于今一片荒芜和空虚。在娱乐精神攻陷一切,功利价值渗透一切的商业时代,猎奇和窥伺成为本能,“性感营销”焉能不大行其道。

文化领域的“娱乐至死”,商业领域的“性感营销”……都是精神通胀的产物。这不单纯是不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长,还关乎整个社会的精神风骨。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救赎,有关部门再加强监管、商业再鼓吹道德自律,其实都于事无补,难以真正阻挡“性感营销”的滚滚大潮。纵然是将“性感营销”当成“黄毒”来打击,也至多是警察走了“狼”又来,来来去去不停歇。到最后,还得像改称小姐为“性工作者”一样,另外给“性感营销”起个名儿,无奈地默认其存在。 陈一舟

极端天气就在身边



进入8月后,尤其是9月以来,中国川陕豫晋等地持续出现阴雨天气。近日,受冷空气影响,中国东北地区出现初霜冻,江南地区出现寒露风。

2011年前8个月,美国经历了各种各样奇怪的破坏性天气。从芝加哥两英尺厚的暴雪,到南部破坏性的龙卷风和热浪、创纪录的洪水,再到过去几天已烧毁德克萨斯州1000多户人家的野火,大自然一直在发脾气,代价高昂。气候专家将其归咎于全球变暖,气象学家列举拉尼娜天气现象或自然变异的影响。但是综合考虑短期天气事件和长期效应的多样性和破坏力,更多的科学家认为,气候本身似乎在变化,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普遍。 焦海洋/图

“彭宇案”之后,扶一下摔倒的老人似乎成了社会难题。9月2日,武汉的李老汉摔倒在地无人敢扶,最终窒息身亡。这种悲剧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的悲哀,也是道德的沦丧。

扶老人易,扶道德难

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彭宇案后,一次次的助人为乐惹祸上身,让全社会出现了“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和目击证人,就不敢做好事”的窘境。昆明许女士搀扶摔倒老人之前,先找了两个小伙作证。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。道德有了法律的保护,善心才能“有恃无恐”。新加坡法律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规定,实际上是如果事后反咬一口,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,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。影响恶劣、行为严重者,则以污蔑罪论处。

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,人们的道德选择充满着功利性。随着“彭宇案”、“许云鹤案”和更多因救助老人而受委屈的事件频发后,人们潜意识里认为“该出手时,不出手”也是一种自我保护。南通的“讹人老太”事件,直接暴露了部分人之“人心不古”。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世风日下的局面,有关部门应从相关制度建设着手,使“行善有奖”的激励和“讹诈有罚”的惩处变成制度常态。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颗道德的种子,但如何让种子发芽并茁壮成长,无疑是要靠整个社会的呵护。存心讹诈的人屡屡出现,实际上是相关法规的不完善,司法者枉法而判的结果。在道德难以企及的角落,法律应施以援手。在这一点上,美国加州议会通过“好心人免责条例”可以借鉴。该条例规定:没有法定义务也没有约定义务,出于道德要求无偿对他人进行帮助的人,即使在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失误,也享有法律上的豁免权。

康德说“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,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,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”。李老汉去世后,他87岁的妻子为自己签下的一份免责声明:“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,施救者免责。”这是无奈的自救措施,更是对道德与信任的呼唤。扶老人易,扶道德难。被司法者扭曲的价值观,不仅需要道德回归,更需要法律来“护航”。 尹鹏志

“行程1600公里,共被收了5次费,一共是3.1美元”,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最近在美国的经历,这种经历引发了公众公路收费的热议。方先生引发的热议还没有消退,19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盛霖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有关“收费公路政策需要继续下去”的表态,又把公路收费的问题推向舆论的焦点。

“筹钱”不是永远收费的理由

作为国家的公路管理部门,做出这种判断当然有根据,比如“贷款修路、收费还贷”是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政策的重要内容,“当前,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采取收费公路的方式建设和发展高速公路”,“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”等等。但是也有民众表示不理解,甚至反对。普通人的态度,并不是说“无理取闹”、“故意找茬”,他们的判断来自于直观感受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情况。这些情况表明,不能总拿“筹钱”作为收费的理由,管理部门有必要考虑公众的直接感受,制定更加合理的政策回应民意。

首先“收费站多”、“费用贵”是好多人切身感受。比如,在“百度地图”中嵌入“收费站”三个字,搜索后,在这张地图上,密密麻麻地显示了18900多个收费站,如果不放大地图,你根本分不清个数。收费站多,路桥费也就很高。有网友透露,从北京自驾到大连,一共820公里,费用是380元,约合每公里5毛钱。“820公里380块钱”和方先生的“1600公里3.1美元”一对比,当然有很大的心理落差,公众当然会有意见。

其次,“贷款修路、收费还贷”,谁都能理解,但是公路不能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“提款机”,甚至由于收费不透明、管理不规范,引发了一些腐败案件。有些公路的还贷期早过了,但是还搬出种种理由照样收费不误。比如,北京市审计局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,总造价约10.15亿元的京石高速早在2000年已还清本息,到2004年底已盈余近6亿元。而北京市路政局却曾于2004年答复社会质询称,京石公路还清贷款本息的时间是2026年,还有8亿贷款没还清。什么时候能还清,成了一本糊涂账。更有一些高速公路已经被纳入了上市公司,成了母公司的“摇钱树”。上述情况并非个别例子,这让公众如何感受到公路的“公益性”?

再者,交通费用过高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。据世界银行专门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高速公路的研究报告,在车辆通行费所占人均GDP的比例中,中国超过2%,超过美德等发达国家,中国的通行费可承受性是世界上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。如此高的通行费,不利于社会的物资流通,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水平,不利于应对通货膨胀。

公路要不要收费?还要收多长时间的费?对于这样的一个民生问题,管理部门更需要听听公众的切身感受。据财政部的最新数据表明,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.29亿元,同比增长30.9%。由此测算,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。因此,在居民收入增长不快的背景下,再说“缺钱”、“筹钱”就有点太简单了。

我们不可否认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,努力减少收费,但是这些措施与民众的预期和感受还有差距。在公路收费这样的问题上,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民众的要求,对于公路收费的情况要向公众做一个详细解释;能取消的,尽量取消,让民众切实感受到收费下降的好处;暂时难以取消,也要制定一个时间表,从而对终结公路高收费乱象树立信心。 吴华伟

修正一个错字 代价有多大

江西省修水县城建设局《关于同意建设赣西北液化石油气中压储备库项目的批复》中,工作人员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中规定的“储备”写成“储配”,这一字之差导致当地百姓燃气有限公司因此成了一座“死站”,无法为附近居民提供灌气服务。(9月19日《江西日报》)

批文中一个错字导致上千万元招商项目无法营业,为了修正错误,百姓燃气公司历时14个月跑了30多个部门盖了100多个印章,各类审批材料多达40公斤,至今依然无法拿到《气瓶充装许可证》,这其中的“奥秘”远非一个错字所能承担。

工作人员为何会把“储备”写成“储配”,新闻披露说在江西修水方言中“配”和“备”发音高度相似,所以才出现了“人为失误”。可事实上,修水县城建设局至今不愿意更正这个“失误”,这说明把“储备”变成“储配”可能也并非无意为之。从新闻中我们

权力可以“商请”法院“暂缓执行”?

这未免让人感慨:地产大老板,背后有靠山。房地产是牵扯大利益的领域,利益与权力拥抱在一起,无往而不胜。你一个买主,还想从地产老板那里拿“违约金”?法院判了也没用,权力可以“商请”法院“暂缓执行”。

“商请”是哪玩意?好委婉的口气啊,是跟你商量啊,提请你怎么样着啊。权力干涉司法,甚至权力左右司法,这并不鲜见。

13年的房子,搁在现在出手,那地产商是赚翻了,收回来再卖那么多。可是,当年定下的契约,你能反悔么?而且,在公平环境中,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契约的交往方式,必定非常重视权利和义务的平衡,并且为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提供最有效的保护机制,从而解决社会交往中的冲突。契约文明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政治文明当然离不开法治文明,那么必然也离不开契约文明。可是,当一个地方的政治权力向省级法院“商请”暂缓执行已生效的判决与裁定之时,这还是“政治文明”尊重“契约文明”吗?当地政法委书记“严厉指出”要停止对地产公司巨额赔偿金的执行,可见权力与公司、与司法之间的实际关系。难怪早就有人说出某些“政法委”乃“法上委”。

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,温家宝总理与企业界对话,就政治体制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该做的工作,谈了五点看法:第一,坚持依法治国;第二,要推进社会公平正义;第三,维护司法公正;第四,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;第五,坚决反对腐败。联系许多现实案件,这话很对“棒头”:坚持依法治国了吗,还是“依权治国”?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了吗,还是权力干涉了公平正义?维护司法公正了吗,还是权力扭曲了司法公正?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了吗,还是强化了权力的专横独断?腐败被坚决反对了吗,还是背后“腐败的水很深”?

温家宝总理说得对:“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,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,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,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。为此,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。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,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。”(见新华社9月14日电)

要想让权力“非诚勿扰”,那么现在最要“商请”停止执行的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外的种种权力活动。 徐迅雷

“穿马甲”的驻京办与“兜圈子”改革

驻京办撤销令发布一年后,媒体调查发现,地方政府驻京办改头换面,依旧在京“潜伏行动”。这是一个并不意外的结果。道理很简单——利益纠葛不清,拿项目跑拨款、招商引资、接待维稳,严峻的任务摆在那里,哪个地方主官敢轻易地从游戏中抽身而出?

服务联络中心;不让公然挂牌,就把办公室搬到居民小区里;不让以正规身份行动,就不对外公开身份,甚至不印名片,搞熟人交往;不让搞驻京办大楼,就把手搞个酒店旅馆交通运作……总而言之,你有张良计,我有过墙梯,你让我“名亡”,我就跟你搞“实存”,事儿还是那些事儿,活还是那些活,只不过穿什么马甲见什么人而已。这俨然是对严肃禁令的变相嘲讽。犹记得全国上下对“驻京办”一片声讨之时,广东东

莞市曾总结外省市考察经验,结论就是“重设驻京办”,因为必须加强“和中央部委的人脉资源和资源争取力度”。这就注定了“部”照样跑,“钱”照样进,酒照样喝,礼照样送。

“驻京办”穿马甲只是冰山一角,背后有沉重的体制改革问题。根本之道,是要从中央有关部委层面,制定明晰的利益分配方法,铲除大量寄生于审批权上的腐败土壤,尽最大努力,让“跑”和“不跑”都能被完全平等地对待,否则再严格的禁令制造出的也只能是短时间“好转”的“假摔”,矛盾只是在变换方式“兜圈子”,“驻京办”这只过街老鼠,也必然每过一段时间就跳到路面上来,恶心大家一番。

中国很多社会弊端,都需要从根源上寻找病源,开方治病。在土壤和根部不能下决心,花大力气徐徐图之,都铆足了劲在枝杈杈上做各种文章,结果只能是一些虚幻的管理泡沫。 毕诗成